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亲历者言】	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选载之一）	陈楚三
【千秋功罪】	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我在文革漩涡中》自序	聂元梓
【史实辨析】	钱钟书女婿自杀真相	黎 虎
【亡灵祭坛】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罹难者名录	陆伟国
【狰狞岁月】	徐霁田之死	周继能
【往事如烟】	清华记忆点滴	庸 猫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亲历者言】

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选载之一）

• 陈楚三 •

〔编者按：本文作者陈楚三，生于1942年。其父亲陈潭秋为中共一大十二名代表之一，1943年在新疆监狱中被盛世才当局杀害。陈楚三1960年从北京一零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在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陈楚三是清华的“四一四”派学生领袖之一。本文摘自他的近著《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的第五章，经本人同意由本刊转载。〕

第五章 新瓶装旧酒

1979年6月，我和吉新玉（作者妻子，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编注）同时到总参炮兵研究所报到，穿上了军装；她参与战术导弹的论证，我则在研究所的计算站工作，两人真正专业对口了。

第一节 躺着中枪

当时炮兵研究所的计算器型号是TQ—16，这是上海计算器厂生产的一款晶体管计算器，不少单位都在使用；我大学同班同学张翼鹏、张棠棣夫妇所在的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自动化研究所，也有一台TQ—16，据说TQ就是“图强”（取二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张翼鹏戏言，应该把它改称ML—16，ML即“毛驴”，因为它的指令周期太慢。我在机房负责软件维护。工作期间，参加了厂家组织的两次培训，使我对该机的软件结构有了深入了解，并得到了全部软件的源代码。源代码都是八进制数字，厚厚的几大本；回所后，我埋头在机房，用了几个月时间逐条指令解读，画成程序流程框图，也有上百页。TQ—16的数据输入是穿孔纸带，存储介质是磁鼓，虽然配置了磁带机，但根本无法使用；我看了磁带机的程

序，发现确实不能用，于是根据 TQ—16 的指令系统，自行编制磁带机的运行程序，使磁带机运转起来，但因硬件问题，磁带机始终未能正常使用。后来研究所给机房购置了微型机。我根据随机数据自学了数据库语言 dBASE—II，并以此建立了研究所科研项目计划数据库检索系统，获得军队科研成果三等奖。

在炮兵研究所，计算站所在的研究室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有一位副主任刘金生，他的父亲刘九洲（注 5·1·1）是老红军，1936～1940 年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曾为掩护周恩来脱险而身负重伤。我和计算站的同事们关系都很融洽。赵于平，是一零一中比我低一届的校友，他的父亲赵品三（注 5·1·2），不但是晋中党组织的创建者，而且是工农红军军服的设计者，是中央苏区话剧运动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建国后曾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近年来赵于平发表多篇文字，针对一些文章、电影有意无意贬损朱德的种种奇谈怪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特别是陶然，她原名朱东北，是解放战争中在东北牺牲的四野炮兵司令员朱瑞将军的女儿，她工作努力、平易近人，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我在离开炮兵研究所后也和她保持着联系。后来陶然患乳腺癌动了手术，1990 年乳腺癌复发、转移；陶然住院期间我去看望，她把 1986 年夏吴忠将军的口述回忆录音共 16 盘磁带给我一套，并嘱在以后适当时机整理发表。陶然于 1990 年 11 月逝世，21 年之后，她的丈夫李大震和我共同完成了她的遗愿，《吴忠口述——几件大事亲历记》的部分章节在《炎黄春秋》发表。在整理吴忠录音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敬佩这位老将军的忠诚、正直，也为他在遭到冤屈的情况下仍忍辱负重，亲赴前线指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无私胸怀所折服。

1976 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吴忠是清场行动的现场指挥，天安门广场并没有打死人（详见《炎黄春秋》杂志 2012 年第三期）。1977 年 3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忠代表北京市委发言表示，“天安门事件”中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引起很多人不满。此后中央曾进行了三次调查，结果都是没死人（注 5·1·3）。但两年后的 1979 年 9 月 12 日，吴忠被调离北京卫戍区，第二天邓小平召集会议（吴忠本人已不能参加），特别指名批评吴忠说，天安门事件没死人，吴忠这话讲得太绝对，我这里（拍了拍衣兜）有材料，至少死了六个人！对于邓小平的指责，吴忠表示“一个死人的证据也没有见到就断定死了人”，这“是唯心主义”，“‘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想，邓小平不是无缘无故给吴忠栽赃，他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四人帮”认为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打倒了“四人帮”，天安门事件就成为邓小平重要的政治资本，渲染天安门事件死了人，甚至“血流成河”，才符合邓小平的政治需要。

研究所的工作实在，生活平静。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用现在的流行语说，是“躺着中枪”了。

如前所述，1980 年中共中央为“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但 1981 年又发生了原国民党特务、曾在当年蒋盛勾结审讯陈潭秋毛泽民时担任书记官的郑大纶借写回忆录之名继续诬陷的事件。为真实反映共产党人当年在新疆的活动和四年狱中斗争的历史，1984 年春，当时的中办副主任高登榜（注 5·1·4）报经中央党史数据征集委员会同意，牵头组织编写我党与新疆盛世才统一战线建立和破裂的史书（后来定名为《新疆冤狱始末》，陈云题写书名），《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以高登榜的秘书罗植楠为组长，借调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张志安、当年从新疆监狱出狱的吉新军为副组长，后来又增补我为副组长。

这年7月，我远赴新疆乌鲁木齐，为《新疆冤狱始末》查阅档案、收集数据；8月中旬回到北京。回来不久，陶然找到我，劈头就说：“老大哥！你闯祸了！”我比陶然大几岁，所以她称我“老大哥”。我莫名其妙，问她：“怎么了？我刚回来，闯什么祸？”她反问我：“你给中央写什么信了？”我一头雾水：“我没有给中央写过信啊？”陶然说：“你的信陈云有批示，在干部子弟中早就传开了。”陶然说：陈云批的这封信肯定是你写的，信中为文革中的红卫兵打抱不平，批评许多干部子弟是“八旗子弟”，等等，陈云批示说这是为文革翻案。听陶然说了信的内容，我才恍然大悟，我告诉她：我确实写了一封信，但我并不是写给中央的，信的内容也不是传说的那样，至于信怎么到了陈云手里，我也不知道。后来才逐渐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内情。

1983年，我曾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干局某处处长的李志民写了一封信。李志民1958年毕业于北京一零一中，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我中学和大学的双料学长，我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工作时，他在院政工组；文革后李志民调到水电部担任刘澜波部长的秘书，刘澜波去世后，李志民调至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他的副处长刘泽彭（注5·1·5）也是清华校友，刘泽彭与陈云之子陈元同班，但我并不认识陈元和刘泽彭。

1983年上半年，李志民找我，说当时大批解放和提拔干部，但很多干部住了多年牛棚，不知道红卫兵、造反派是怎么回事，他希望我写个关于红卫兵的材料作为参考；我开始谢绝了，请他找彭小蒙或李冬民（注5·1·6），但李志民仍然希望我写。后来我提出，红卫兵起源于中学，我不了解中学红卫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红卫兵，太杂，我也不了解；我要写只能写大学，而且只能写清华大学的情况。李志民同意了。

我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业余时间，一气呵成，给李志民写了一封长信；限于当时的条件，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此信以后的遭遇，因此写完后既未留底，也未留副本，而是直接寄给了李志民。谁知就是这封信闯了“祸”。

我多方打听，有人告诉我，那封信李志民认为写得不错，送当时的青干局局长李锐（注5·1·7）阅，李锐看了后请青干局有关的正副处长传阅；李志民的副处长刘泽彭看过后，背着李志民把此信通过陈元交给陈云秘书朱佳木（注5·1·8）转给陈云。陈云对我的信作了批示，大意（据传）是我的信为文革翻案，对清华的蒯大富和陈楚三都不能信用，等等；其他中央领导也画圈或者作了批示。这期间李锐已经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志民已是中组部青干局局长，而刘泽彭也升为青干局副局长。据了解，中央政治局为此发了一期《参阅文件》（或者如同后面所说对孔丹信的处理，发《政治局会议文件》），内容分四部分：首先是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批示；其次是按语，介绍我在信中向青干局推荐的清华三个人（罗征启、沈如槐、任彦申）的情况；第三部分是我的信的摘要；第四部分是我信的全文。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该文件，也不知道陈云批示的确切内容；但是由米鹤都编撰的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登载了1984年2月陈云对孔丹来信的批示，其中强调指出“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决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由此判断，陈云对我给李志民信的批示，内容肯定十分严厉。我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曾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概不至于被抓起来，但被批判、转业到地方等等还是有可能的；当时正是全国范围整党期间，也可能以此为由不让我登记。我想，不让我登记，或者批判我，你就得把材料拿出来，那么我就可以要求公布我的信，借机阐明我的观点，让大家评判我写的是否事实。不过，也许因为陈云批示的文件只发到省军级，而炮兵研究所仅为地师级；也许因为陈云批示对我还要“给出路”；也许有别的原因；总之所里并没有为难我。

1985年夏，时任清华大学分校（北京自动化工程学院）校长的罗林（女），动员我转业到清华分校，并说准备推荐我担任校党委副书记。我把陈云等中央领导批示的事告诉了

她，表示北京市委不可能让我担任这类工作；但因部队对计算器应用方面与外界的交流限制太多太死，还是愿意到学校去搞专业。当我提出转业请求时，转业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所里没有名额了；为此我给薄一波写信求助，实际上也想测试一下薄老对我的态度（据传，他对我那封信也有批语）。听说，后来是一位姓杨的军委首长亲自过问，给炮兵研究所戴帽增加一个转业名额，就是我；有人说我这是“高射炮打蚊子”，“走了那么硬的后门，只为了一个转业名额，多不值！”言外之意我应该走后门要“官”，但我知道按自己的脾性，并不是当“官”的料；何况有陈云批示在，给“出路”就不错了。我转业到自动化学院后，罗林校长确实为推荐我做了努力但同样失败了，后来找我谈话说，你还是力争在专业上、在教学岗位上做出成绩吧！

现在，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离开我们；经历了更多风浪的中国共产党，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人，应该能够更加冷静、更加客观地审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我始终认为，陈云对此事的处理过于情绪化，过于简单化，欠缺慎重的考虑。

首先，我的这封信是给李志民写的私人信件，刘泽彭背着收信人把别人的私人信件“捅”上去，这种打“小报告”的做法，我相信为一切正直的人们所鄙视，是应当受到谴责而不应当鼓励的。我不知刘泽彭这样做出于何种目的，我的直觉认为，他是为了向上爬，为此就得踩着别人的肩膀；事实上，李锐被免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职务就与此有关，而刘泽彭则不断“进步”，跳过他的局长李志民，直接担任了中组部副秘书长，不久又升为副部长。其次，即使信是写给党中央的，这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无论信中的观点是否符合当时党的要求，都应当受到保护和鼓励；就算是错误意见，也不应该扣帽子、打棍子。第三，这封信的内容，忠于历史的事实（例如说叶帅赞林彪，总理夸江青等），观点也没有根本性错误。说此信为文革翻案，是曲解；只要认真看过该信的全文而不是断章取义，就能得到正确结论。

1985年，《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集中在人大大会堂高登榜办公处审稿。有一次罗植楠从外面进来对我们说，他在大会堂碰到陈云秘书朱佳木了，朱佳木告诉他，陈云听说写那封信的人是陈潭秋烈士的儿子以后，批评朱佳木：“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这是潭秋同志的儿子，我就不会那样批示了。”罗植楠知道我那封信的遭遇，无非是想用朱佳木的话安慰我；但听到朱佳木的传话，我不仅没有感到安慰，反而愕然。作为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怎么能以亲疏关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外人”写的东西，不合自己的意就无限上纲，而“自家人”写的东西，错了也可以格外宽容；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陈云，这位过去威望很高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降低了不少。

还有一件事，也印证了陈云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以亲疏关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就是我的老师和朋友罗征启“待业”事件。

罗征启，文革前是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复出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1980年，罗征启被送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担任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十七班党支部书记兼班长，尉健行（注5·1·9）就是该班学员；田纪云（注5·1·10）则为十八班的党支部副书记。我们都听说，罗征启从党校培训班结业后将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但是，1981年暑期罗征启从党校培训班结业，并没有能调到团中央，而清华大学也回不去，此后长达七个月时间赋闲在家，我们戏称他是“待业高干”。罗征启对他的这段经历有详实的口述回忆。

调罗征启去团中央工作，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点名要的，而最终没有调成，据中组部透露，是因为“陈办”（即陈云办公室）不同意。

“陈办”为什么不同意罗征启去团中央工作？当时姚依林（注5·1·11）曾说过理由：“听说这人有点偏激，是不是再看一看吧！”罗征启自己说：“我知道说我偏激是指什么。但我当时的工作性质和党性原则要求我必须那么做。”

究竟说罗征启“偏激”是指什么？这就涉及到陈元出国一事，此外似乎没有别的“例证”。

陈元是清华70届毕业生，文革后的1978年考回清华读研究生。

1979年，陈元想公费出国，就写了报告给王震，王震批了“同意”，陈元拿着王震的批条找教育部长蒋南翔。蒋让陈元找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注5·1·12），刘达也批示：“同意。转外事办”。

但公费出国需参加考试，当时已经考过，出国的名单也已确定并公布了。陈元没有参加考试，就直接特批其出国，势必要把别人挤下来，外事办当然很为难。清华外事办推给教育部外事办，教育部外事办说：“这叫我们怎么做工作？”清华外事办和教育部外事办对特批陈元公费出国的事很反感，有意把这事张扬出去。一时清华、北大都知道了，两校一片骂声，骂陈云，骂王震，骂得很尖锐，说什么的都有，如：“陈云当了中纪委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儿子谋利益。”清华不仅骂陈云、骂王震，也骂刘达。

陈元出国之事在教师中反映强烈，但学生中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清华党委宣传部主管教师思想工作，面对教师们对个别中央领导人的一片骂声，几经考虑，担任宣传部负责人的罗征启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宣传部干部胡大炘也签了名，信的大意是：

公费出国要考试。现在考试期已过，公费出国的名单已定，正在派遣。陈元这样做使我们的工作很难做。影响也不好。群众中已经为此事责骂中央领导同志。请您干预一下，这一批不要让他出国。我听说他想改为自费出国。目前，中央领导人子弟的自费出国影响也不好。以后有其它机会再安排。

陈云秘书拆阅这封信后，立即告诉了陈元，陈元很不满意，说：“我们父辈打下了江山，想不到我出国这点小事还这么麻烦？”他又打电话给刘达，刘达为此严厉批评了罗征启。罗征启认为陈云秘书的做法“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今天这样做，说不定明天就会有儿子和秘书联手整我。”罗征启的看法是对的。陈云秘书把这封信的内容透露出去，尤其是透露给当事人，这是完全违反组织原则、完全违反秘书职责的丑行。如果做这件事的陈云秘书就是朱佳木，我不会感到意外；我意外的是，陈云一向以坚持党的组织原则、组织观念强而著称，发生此事后为什么不按组织原则处理？看来，原因还是：秘书和儿子都是“自家人”。

陈元不久后设法转至社会科学院并出了国，这在清华园被调侃是“飞过海”。耐人寻味的是，现在国内官方报道陈元的简历时，说1978—1981年他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抹去”了他曾在清华读研的这段历史。

顺便指出，陈元在“我出国这点小事”上的态度，流露出的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再强调要坚决反对的特权思想，这种特权思想在陈元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越发膨胀，以至有传言说，他在国开行行长任内，乘车出行要“方便”时，会先派人去喷洒香水，后来则带房车随行以利“方便”！无风不起浪，但愿这不是事实。

罗征启“待业”七个月后，中组部终于安排他回清华继续担任党委副书记。此后天津市、中信集团等单位都曾想调罗征启，均未成功。1983年7月，经“三部一办”同意，调罗征启到深圳筹建深圳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罗征启知道“三部”是教育部、中宣部、中组部，他以为“一办”是中央办公厅；清华党委书记告诉他，不是“中办”，是“陈办”。

难怪有人说，罗征启一直在“陈办”控制之中，一直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我在1983年给李志民写信时，只知道罗征启曾为“待业高干”，并不知道他是得罪了一手掌控着中组部、对干部任免几乎有一票否决权的陈云，还一本正经地向中组部青干局局长李志民推荐罗征启呢！

注释

注5·1·1：刘九洲（1919·9·9—2008·7·9），江西省零都人，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曾任周恩来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八局保卫干部，前门饭店总经理等职。

注5·1·2：赵品三（1904—1973），山西省榆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中央苏区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兼工农剧社总社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

注5·1·3：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往事》

注5·1·4：高登榜（1914·12·4—1997·7·28），在新疆时化名高玉成。陕西省延川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中央国民经济部工矿局局长。1938年10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新疆工作，曾任喀什地方税务局副局长，沙雅县税务局局长等职。1942年9月17日，中共在新疆全体人员及家属同时被盛世才软禁。在此后近四年的软禁和监狱斗争中，高登榜同大多数中共人员一样坚贞不屈，经党中央营救和张治中将军大力帮助，于1946年7月集体出狱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注5·1·5：刘泽彭时为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副局长，后为青干局副局长，中组部副部长。山东黄县人。文革时为清华大学学生。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注5·1·6：彭小蒙，女，文革时为北大附中的学生。文革初的1966年5月底参与组织“红旗战斗小组”并担任宣传部长，曾致信毛泽东并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支持。李冬民，文革时为北京25中学生。文革初期反对工作组遭到批判。后来是北京中学生“四四派”头头，1967年4月，成为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注5·1·7：李锐（1917·4·13—），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局长。后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湖南岳阳人。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陈云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注5·1·8：朱佳木，朱理治之子，时任陈云秘书。文革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注5·1·9：尉健行（1931·1·2—2015·8·7），到中央党校培训前为哈尔滨国营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党委书记、厂长，培训后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浙江新昌人。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家监察部部长，全国总工会

主席，北京市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注5·1·10：田纪云（1929·6—），到中央党校培训前为四川省财政厅长，培训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山东肥城人。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注5·1·11：姚依林（1917·9·6—1994·12·11），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安徽省池州市人。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是中共第八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注5·1·12：刘达（1911—1994），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黑龙江肇源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第二节 三十年前的一封信

载在《华远》2013年第五期的孔丹等二人给陈云的信及陈云批示，是《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的附件，这个附件的名称和文号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据说是孔丹照原件一字一句抄下来的，肯定不会有误。

陈云批示原文如下：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陈云批示中所谓“陈楚三的材料”，应该就是我在前文中提到的、由刘泽彭捅上去的、我给李志民的私人信件。究竟这封信的什么内容触动了陈云的敏感神经？由于未留底稿，且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之久，其内容只能靠回忆了。

记忆所及，信的内容大致如下（但用词不一定准确）。

写该信时，中央已经发布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在信中指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左倾路线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中央其他负责人同样有左倾错误，例如，清华的蒋南翔并不是毛泽东打倒的，而是在刘少奇主持下揪出来打倒的。我指出，红卫兵产生于中学，传说中学红卫兵起初是秘密组织，成员都是高干子女，以江青照片作为联络暗号，因此，红卫兵本身就是左倾路线的产物。

谈到文革，我提出，在党的六十多年（当时）的历史中，文革占了六分之一；对长达六分之一的这段党史，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要看到党内健康力量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这是《决议》的观点），要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同样，对红卫兵也不应当看做洪水猛兽，不应当简单否定；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红卫兵自身也在分化，走向反面的红卫兵是少数，多数成了逍遥派，但也有一部分红卫兵以各种方式同中央文革抗争。我举了中学老红卫兵后来组织“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在狱中“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的例子；我举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韩爱民等人和四人帮抗

争的例子；我举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原一把手朱成昭反江青、反中央文革而又拒不认错，被说成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例子。当然，我更写了我所参加的清华414“全体反谢（富治），骨干反陈（伯达），核心反林（彪）”、冒着巨大风险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进行艰苦抗争的情形；我说，从文革中我得到了锻炼，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不因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而后悔。

谈到所谓“上当受骗”问题时，我写道，我作为共产党员，就要听党的话。听党的话总要具体到人。林彪摔死了，江青是反革命，他们的话不能听；可是叶帅曾经在一次大会上说：林副统帅只有59岁，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非常健康，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周总理则多次指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难道叶帅的话、总理的话我们都不信、都不听？那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上当受骗，那就只能说我们上党中央的当、受党中央的骗了。这里没有写出来的潜台词是，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做了正式决议的，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致支持的，我们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成是上林彪四人帮的当、受他们的骗，如果一定要说受骗上当，就应该说是受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叶帅在内的党中央的骗、上了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叶帅在内的党中央的当。

我还写道，许多老同志、老干部，早年参加革命，负过伤流过血，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却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错误，中央对他们倒很宽容；而大量年青学生，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只凭革命热情，犯了错误却判刑很重，如蒯大富就判了十七年。我认为这不公平。

我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我说，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文革初期还在台上时，他们很革命，敢造反，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旦他们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他们就逍遥了，有些甚至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仰也动摇了。比较起来，很多工农子弟、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他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积极参加运动，真正做到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此，我在信中向青干局推荐了清华非高干子弟的三个人：罗征启、沈如槐和任彦申。

我在信中还指出，对毛主席的“禁区”已经打破了，但又出现了新的“禁区”，也应当打破。这是暗指对周总理的“禁区”。

我的信是写给李志民个人的，他是我的朋友和学长，所以我无所顾忌，虽然派性难免要重一些，但讲的都是实话，举的都是实例，却被陈云断定是要“把水搅浑”。我盼望着有一天能像孔丹一样，获得陈云对我给李志民信作出批示的中央政治局文件。

陈云的批示对我和我的家庭产生了如下影响：

我的岳父吉合是建国初期我国的驻苏武官，回国后参与创建军事科学院并担任外军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被关押八年之久；文革后任军事科学院顾问，一九八三年初去世。考虑到岳母年高体弱，需要身边有子女照顾，我的妻子吉新玉（当时也在炮兵研究所工作）联系了军事科学院运筹室，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也已同意将吉新玉调入，就在准备办理调动手续时，突然传来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注5·2·1）发的话：“不能让陈楚三这样的人进军科大院”，吉新玉因此未能调到母亲身边。

我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工作时的政工组同事丁文，其丈夫苏平担任海军论证中心主任。当时论证中心已经洽购美国一台大型计算机VAX-780，急需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丁文推荐了我。海军论证中心多次催促尽快调档，但炮兵研究所不放人；被迫无奈，

我找到正在医院住院的炮兵部领导恳求，炮兵部领导点了头，所里才同意调出档案。谁知调出档案后一周左右，论证中心突然电话通知我档案退回！此事在炮兵研究所曾经轰动一时，引起各种议论。

再回到我的那封信。究竟那封信的什么内容触动了陈云的敏感神经？我猜测，我的信指出“文革”前中央主要领导人（而不只是毛泽东）都犯有左倾错误，信中把一些高干子弟称为“八旗子弟”并对其中一些人的评价比较负面，还认为对“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应当一分为二，以及以叶帅赞林彪、总理夸江青为例说“上党中央的当，受党中央的骗”等，引起了陈云的“警觉”；但是，我在信中竟然推荐已经得罪他并在他那里“挂号”三年之久的罗征启，甚至为已判刑十七年的蒯大富“鸣冤叫屈”，恐怕才是使他“特别警惕”我的原因。

前面提到陈云为此信批评秘书朱佳木。有人质疑，陈云批评朱佳木只是应应景，因为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挽回措施。我则认为，朱佳木有意向罗植楠传话陈云对他的批评，是在为陈云打掩护，因为刘泽彭和陈元作为清华学生，都很清楚我是陈潭秋之子，朱佳木也不可能不知道，而朱担任陈云的秘书却不告知陈云，这是难以想象的；除非朱佳木和陈元串通一起，有意向陈云隐瞒。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的一份资料和我这封信有关，是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整办”）调查组的上报文件，文号为：调报字（83）8号，文件名称为：《清华大学、北师大“文革”期间造反组织的情况调查》。

文件开头说，“根据耀邦同志和一波同志的批示，北京市委段君毅同志派人清华的派系情况和北师大‘文革’期间造反组织的情况作了调查”，文件中还提到“来信人陈楚三”；据此判断，应该是在陈云对我的那封信写了批示后，作为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和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即批示要北京市委组织调查，而本文件就是“北京市委调查材料摘要”。

文件中专门有一段提到我：“来信人陈楚三是‘414总部’核心成员，负责宣传，在清查中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文革’的表现记录在案”。

文件表明，把北京市委调查材料摘要整理完成的时间是1983年11月30日，上报时间是1983年12月2日；而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是依据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的决议设立的；因此，北京市委的调查应是1983年10月至11月完成的。

我没有看到北京市委的调查材料，但看到一份应该是清华大学党委写的调查材料，题为《清华大学“文革”期间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产生和演变（未定稿）》，北京市委调查材料当以此为基础。在该材料的附件中，列出团派“问题”人员共76人，其中已判刑12人，记录在案53人，其余11人为已自杀、正在清理或已做其他处理；四派“问题”人员8人，均记录在案。在“主要问题”一栏里写着“没发现什么问题”但却仍然“记录在案”的，只有414的二把手孙怒涛和我两人。

按照1983年4月23日中组发（1983）6号文件要求，记录在案材料“应该就基本事实同被记录人核对”，“经过核对的记录材料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存入本人档案”。至少就我而言，既没有人找我“核对”（可能因为“没发现什么问题”，无“错误事实”可核对），又没有人征求过“本人意见”，我就这样背了几十年黑锅而自己却蒙在鼓里。

前述中整办调查组的上报文件，只印20份，送“指委会主任、副主任，各顾问，办公室副主任”；毫无疑问，陈云肯定看过这份由他的批示引发的调查材料摘要，也肯定注意到“来信人陈楚三”在清查中“没发现什么问题”，但他仍在两个多月后强调“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

据说在刘泽彭拿我的信以反面材料打“小报告”前后，李锐也曾以正面材料向陈云推荐了此信。当时正是中央抓紧“第三梯队”建设的重要关头，陈云认为我的信说明我是造反派，而李锐是想在“第三梯队”的建设中提拔造反派，这成为李锐被解除中组部副部长职务的重要原因。罗征启，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任党支部书记兼班长，似乎比同期学习的尉健行、田纪云更受重视，说明他本来已经是“第三梯队”的一员，很可能还排在第三梯队的前列，但他为了陈云的爱子出国这么一件“小事”而上书陈云，在高层一些人看来，却暴露了他对老干部缺乏感情、吹毛求疵、“偏激”的造反派嘴脸；所以，在“第三梯队”的梯子上就没有他的位置了。此外，罗征启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当与根子硬的高干子弟竞争同一个职务时，被挤掉也并不奇怪，毕竟在陈云眼里，高干子弟是“自家人”。

有人推测，以孔丹、董志雄名义写给陈云的信，很有可能是针对我给李志民的信而精心策划的，说不定就是陈云授意甚至修改的产物。孔丹书中提到，1984年，曾按陈云要求，在其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成员包括朱佳木、陈元和孔丹等人；当然，我给李志民的信及陈云对该信的批示，和对我“没发现什么问题”的前述中整办调查组文件，都摆在这个小组面前。我的信既贬损了“八旗子弟”即高干子弟，又推荐了在“陈办”已经入另册的罗征启，肯定是朱佳木、陈元、孔丹都不能容忍的。对罗征启好办，已经打发到深圳去了，关键是要为“八旗子弟”“正名”，也就是为所谓“老红卫兵”“正名”；孔丹正是“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由他出头给陈云写一封信，陈云一批示，问题就解决了。实际过程也正是按这个思路推进的。

孔丹信中列举造反派的“劣迹”时，还特意提醒“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此提醒有明显的针对性，因为在陈元、孔丹看来，清华414正是造反派中的这种“策略派”，而我给李志民的信中又对414有较正面的评价。我还注意到，孔丹信中特意指出，“老红卫兵”包括了北京“大学生中的‘一司’”（注5·2·2）。然而，一般所说“老红卫兵”指的是中学的早期红卫兵；孔丹信中生拉硬扯要把一司塞进“老红卫兵”，原因只有一个：一司是以高干子弟为头头和骨干的红卫兵。陈云秘书朱佳木既是朱理治（注5·2·3）之子，属于“八旗子弟”，又曾是“一司”头头，孔丹不单要解脱自己，也是有意为朱佳木“护航”。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信中推荐给中组部青干局的三个人。

罗征启，在我写信推荐他的时候，应该是从中央党校毕业并“待业”七个月后，正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前文已经提到，罗当时年富力强，因不少领导推荐而被胡耀邦总书记点将团中央。但因陈元出国事给陈云写信反映，致使仕途受阻。罗征启为人坦诚，胸怀宽厚，对文革中参与致死他弟弟的清华学生孙耘，以德报怨，分别写信给公安局等有关部门，使孙耘不但很快恢复自由而且考取了哈工大研究生。罗征启有敏锐的洞察力，早在文革中的1967年就在很小范围内对林彪吹捧毛泽东提出质疑，并认为文革本身就是极“左”思潮的集中体现。罗征启有很强的魄力和领导力，他主持深圳大学工作六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效卓著、有口皆碑，影响深远，深大的一位老教授多年后曾感慨地评价罗征启“是深圳大学的灵魂”。罗征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后被撤职、开除党籍，没有工资，也没有养老金和社保等福利待遇，甚至十年没有户口，但他仍努力为社会做贡献，自办建筑设计公司，并以所

得利润支援教育及公益事业。罗征启始终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取消党的领导”、“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支持动乱暴乱”等罪名。

沈如槐，在我写信推荐的时候，他在四机部电子技术推广应用研究所（即电子部六所）任软件研究室副主任。沈如槐在清华是好学生，文革前入党并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文革初期主张批判工作组，后因反对蒯大富的极“左”和宗派政策而发起组织“414”并担任一把手。沈如槐为人正直、敢于担当，坚持原则而又不失灵活，表现出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这是我推荐他的主因。他在电子部六所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系统工程的研究开发工作，他所参与研究开发并担任软件课题组长的系统工程项目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电子工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也表明他有出色的专业技能。然而，由于他在文革中曾担任群众组织414的主要负责人，被有关部门“记录在案”，电子部六所力荐他担任研究所领导职务（厅局级）而得不到上级机关的批准。1984年沈如槐任电子部六所副总工程师。1985年初，经时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俞正声（注5·2·4）的推荐，邓朴方（注5·2·5）邀请沈出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旗下康华实业公司总经理，他开始时推辞不就，后经邓朴方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他盛情难却，终于被借调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就任康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但九个月后，他又因种种原因而辞职回到电子部六所继续担任原职。

任彦申，在我写信推荐时担任清华团委书记。我是在1967年初才认识他，他的口才和文字均佳，逐渐成为群众组织414的笔杆子。工宣队掌权后，由于任彦申表现突出，拟发展他入党，才知道他文革前因为有话直说被认为另类，连团员都不是，于是只能让他先入团、再入党。1975年夏，清华大学党委刘冰、柳一安、惠宪钧、吕方正等四人给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谢静宜，任彦申曾起了重要作用（注5·2·6）。后来，任彦申先后担任北京市委教育部副部长、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委副书记。曾为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代表。2006年1月起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任彦申被认为是一个学者型官员和思想型干部，在任职期间，就以敢讲真话直话为人称道，他任职期间曾出版两本书《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和《后知后觉》，退休后2013年又出版《如何是好》，广受欢迎和好评，是省部级官员中难得一见的“畅销书”作家。

罗征启在“陈办”挂号，沈如槐“记录在案”，我向李志民推荐的三人中，只有任彦申没有“案底”，所以他能做到省部级。

注释：

注5·2·1：宋时轮（1907·9·10—1991·9·17），文革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后为院长。湖南醴陵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注5·2·2：一司、二司、三司，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二司”中的北航红旗和“三司”，是文革初期全国闻名的学生造反组织。

注5·2·3：朱理治（1907·7·25—1978·4·9），文革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江苏南通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注5·2·4：俞正声（1945·4—），浙江绍兴人。196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起在电子部六所工作，曾任副总工程师、副所长，和沈如槐共事多年。

注5·2·5：邓朴方（1944·4—），邓小平之子，文革中为北京大学学生，受迫害致高位截瘫。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创办残疾人事业，此后一直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要负责人。

注5·2·6：状告迟群谢静宜，见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未完待续）

□ 摘自《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明镜出版社，2017年

~~~~~

## 【千秋功罪】

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我在文革漩涡中》自序

· 聂元梓 ·

二〇〇五年一月，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当事人，被人妖魔化为“乱世狂女”、“灾星”而且到处传说早已死亡的我，在香港出版了近四十万字的《聂元梓回忆录》，向世人坦诚披露了自己几十年来大起大落、坎坷多难的一生。

这部书出版以后，产生了令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它不但在香港的销路很好，连国内的地摊上，也有了这本书的盗印本。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往事并不如烟。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是难以忘怀、还在继续探究着这十年动乱是怎样发生的？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对文革感兴趣的研究者拿着这本书找到了我，还有许许多多早已相忘于江湖的旧友、甚至包括以前曾反对过我的人，也都相继联系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过去的疮疤被屡屡揭开，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于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越来越清晰了。面对这么多的反馈意见，加之初版书中的不少错漏，使我萌生了重新修订增补回忆录的想法。我虽然拖着病体、年逾耄耋，但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干的一件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事情了。

有人说过，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在中国，历史的吊诡还在于，你越是想来剔除伪史，恢复信史，而掌权者越是讳莫如深，固执己见。就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还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领袖”的罪错？以“何其好也”的那张大字报来说，它恰逢其时地出笼以及所产生的疯魔般的效应，绝非简单的“造反”二字所能涵盖的。这里面既有一个老党员对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正常反应，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北大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积怨的症结。谁又能知道，一个被全国上下视为“造反第一人”的人，仅仅两年之后，就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叫她反右她反左”而被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

在我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阴谋活动。”十年文革，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人事沧桑白云苍狗，其后的八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度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里，不妨谈及一桩往事：文革初期，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当时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

毛泽东了。毛泽东说：“什么池浅王八多，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这句话李讷向我传达了，在校内也公布了，按照当时的规格，应该敲锣打鼓，披红挂绿地宣布“最高指示”才对，但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句话给处理了。

判决书上还有一个历史公案，上面写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青派人把被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审讯我时，我要求江青出庭作证或请法庭出示与江青勾结的证据，可他们拒绝江青出庭作证，既无旁证，又无佐证，可以说没有一个能证明是江青指使我到上海造反的相关资料。现在，我自己从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上，找到了一条最有力的证据，证明派我去上海的，根本不是江青，而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在回忆中详述了这一事件：“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连成一片。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他想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过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传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这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我跟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

还有一件与我们总设计师有关的话题。邓小平曾说过，什么时候看到我儿子，就想到了聂元梓。所以，这也决定了聂元梓一案不让上诉，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的政治判决。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有关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入北大，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关系？更可笑的事，判决书认定：“1968年4月7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于是，硬把这件事情的发生时间提前了将近五个月。什么叫“人治”，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于此可略窥一斑。现在的邓朴方先生，已经厕身政协副主席这样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了，他心里应该最清楚，到底是谁逼迫他跳了楼？这里面除了那个疯狂的时代和不正常的体制之外，还应该包括他的父亲、即身为党的总书记参与制定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邓小平本人。

造反、夺权，是有；抵制造反、制止武斗，也有。没想到文革结束后，原指望能洗清加在我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反倒变调升级了。几十年过去了，作为一个曾经的劳改假释犯，北京大学却不能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我进行安置。现在我还是一个社会流散人员，户口暂存在北京月坛派出所，吃着民政局的救济饭，借住在民政局的救济房。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连当年国民党的官兵战员，都发给了纪念章，可我这一九三七年七月在炮火中参加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却偏偏被遗忘了。真可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来形容了。想想我这一生，“步步紧跟”，却跟出个如此凄凉结局。此情此景，夫复何言？

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动乱，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的党；领导写作“五·一六”通知，举手赞同发动文革永不翻案的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用文革方式加害别人；有的造反派头头如季羨林，竟还成了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道德楷模”。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罪错，就这样利用政治“替罪羊”的审判方式，轻而易举地算在几个人和红卫兵群众的身上了。难道这就是官方刻意营

造的一种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现在不是天天说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吗？我认为，历史本身、尤其是亿万民众所亲历过的文革史，不应该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更不能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倒洗澡水把小孩也倒掉了”。我在文革的漩涡中经历了太多太多，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2008年4月

□ 来源：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出版

~~~~~  
【史实辨析】

钱钟书女婿自杀真相

· 黎 虎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夏志清先生《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原载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9月30日《参考消息》转载）一文在评介杨绛先生《我们仨》等作品时，有一段叙述钱钟书、杨绛的女儿钱瑗及其夫婿的文字：“在文革社会的紧张生活下，阿瑗根本没有时间去恋爱。大概已经30岁出头了，她在工厂里做工，交识了一位‘和善忠厚’的工人王得一，也就同他结婚了。此人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因而自杀以求解脱，那时阿瑗33岁。”读后不禁愕然，因为这里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文中所称阿瑗即杨绛《我们仨》中的主人翁之一钱瑗；“王得一”即钱瑗的前夫。

于是我立即找来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和《干校六记》，对照之后发现涉及钱瑗的夫婿的记述在《我们仨》中很少，主要是在《干校六记》中，而夏先生这段文字在杨绛先生的两书中并无类似的记述。我对杨绛先生的著述了解不多，不知夏先生这段文字是否别有所据？但不论夏文所据为何，上述记叙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我与钱瑗伉俪都熟悉，了解个中真相。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表示对于故友的纪念，故稍事补苴钱瑗伉俪的有关事略于后。

钱瑗的前夫与我是大学的同年级同学，我们于1955年9月同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全年级九十余人，分为三个班，他在二班，我在三班。首先需要“正名”。夏文和杨绛先生的作品中钱瑗前夫的名字都被写成“王得一”，事实上他的名字是王德一，在他大学四年和日后工作中直到辞世都一直用这个“德”，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得”字。他出生于1937年3月，籍贯是山东济宁。大学读书期间，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采取五级计分法，他的学业成绩大部分得的是“优”。1956年搞了一阵子“向科学进军”，王德一被评为“优等生”。四年中他先后担任过学习班长和班主席。1959年7月毕业时，我们两人一起留校，在历史系当助教。他被分配到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一直没有调动，我被分配到中国现代史教研组一年后，转入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从此我和他的交往比在上学时更为密切了。他参加工作不久就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得不错，颇受学生欢迎，这与他的勤奋有关。记得有一天很晚，我看见他一个人在教研组伏案而写，铺着厚厚的一摞稿纸，额角沁着小汗珠，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是修改讲稿。大概第二年他就承担了一个学期的课程，这在青年教师中是很突出的。他也善于为文，故在人民公社化时，大约1959年秋冬，我们一起被历史系领导派去北京郊区的房山人民公社编写公社史，共同“战斗”了半年之久，主要由我们二人执笔写成了一本十余万字的《房山人民公社史》，油印成册，不过后来并没有正式出版。这就是钱瑗的前夫的真实情况，他根本不是什么工人，而是一位

大学教师。至于说王德一“和善忠厚”倒是符合事实的，这在《干校六记》中有一些生动的叙述，与我所了解的王德一是—致的。当时钱瑗在俄语系上学，与王德一是同一届学生。俄语系与历史系同在一个楼——“文史楼”，俄语系在一、二楼，历史系在三、四楼。钱瑗也于1956年被评为“优等生”，1957年7月毕业时也留校工作，在俄语系当助教。1966年转入外语系英语专业工作。他们二人的学历、经历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钱瑗伉俪的婚恋，也不是夏文所描绘的那样。钱瑗、王德一在大学读书时都是学校“美工队”的成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是很活跃的，校园中有各种各样的社团，“美工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二人都很喜爱绘画，画得都不错，我经常看见他们二人忙于“美工队”的活动，举凡宣传活动所需的海报、黑板报等绘画任务都是他们一起参与的。不过，这个时期王德一的恋人尚不是钱瑗，而是我们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毕业时那个女同学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他们的联系就日渐减少以至中断。毕业以后，钱瑗、王德一两人继续以绘画为学校的各种宣传活动服务。由于这种工作关系，他们之间的接触自然就很频繁，这时王德一曾经向钱瑗表露过爱慕之情，但是并没有得到钱瑗的积极回应。直到“文革”中钱瑗才主动向王德一示爱并明确双方的恋爱关系，而他们结婚则已经在“文革”发生后的第三年——1968年初了。由此可见他们相识、相恋的时日是相当长的，过程也是曲折的，并非一蹴而就，草草从事的。

大约1967年冬，我与王德一一起去了一趟天津。那时“文革”的昏热暂时告一段落，学校开始搞“复课闹革命”，宣传队派我们二人去天津师范学院了解那里的“复课闹革命”的情况，据说他们在这方面搞得好。我们花了半天时间在那里看了看大字报，后来就到街上吃饭，饭后逛商店时发现天津的豆制品等小菜品种比较丰富，于是王德一说要买几样带回去请钱瑗的父母吃。当时物资匮乏，这种食品属难得之物。那时他们尚未结婚，由此可见其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德一和钱瑗结婚以后就住在历史系单身教师的集体宿舍——四合院北楼二层西头的一间靠北面的房间里。当时我住在南面的一个房间。德一有时也回钱瑗家住，大约1969、1970年之际，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了，忙完学校的任务之后，我骑车回我迁在东城的住处时，德一也骑着车从后面追上了我，说是要回钱瑗父母家住。我们在地安门分手，我往东拐，他继续往南走地安门大街。

至于王德一的自杀，也不是因为他“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云云。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王德一被驻校“宣传队”宣布隔离审查，其主要“罪行”是“炮打林副统帅”。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王德一在“文革”中除了一般的参加“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活动。从当时披露出来的“事实”中得知，王德一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了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批资联委会”的工作。当时“宣传队”对他发动的攻势非常猛烈，仅举一例就可以想见其余：为了逼迫王德一“端正态度”，特意在文史楼三层西头的大教室里召开了一个历史系与外语系全体师生员工参加的联合“批斗”大会，其用意大家都明白：因为王德一的夫人是外语系的老师。用这种办法来“株连”家属，恐怕也属于“史无前例”的一项发明创造吧？此事件之后不久，有一天上午大约八点半左右，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当时全系师生员工混编为若干小组）正在文史楼三楼一间教室里由一位“军宣队”带领进行“天天读”，忽然杨家兴同学来敲我们的门，说：“不好了，王德一好像是在上吊！”杨家兴同学当时也是被隔离审查对象，他趁大家“天天读”的时间从自己专用的隔离室出来在楼道里溜达，从门缝里窥视王德一专用的隔离室时，发现了这一情况。我们立即蜂拥而出，由“军宣队”带头跑上四楼，由于王德一事先把门插上了，于是众人“强攻”才把门打开。只见王德一吊在北面窗户上的暖气管上，双手还紧紧攥着他在挣扎时抓住的垂挂在窗户周围的标语、大字报纸。人们立即把他解下，放在房间里面一张原先用于裱糊文物字画的大木案上，发现他已经气绝，人们围在他周围不知所措。这时我立即想到：只有马上找医生抢救，其他都无济于事。于是我没有向周围的任何人打招呼就奔下楼，骑上我买

来不几年的“飞鸽”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校医院。到了校医院值班室，我气喘吁吁地说明情况，请值班的周大夫快去急救。周大夫立即拿起急救箱，出来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我使劲蹬车，到了文史楼，急奔四楼。房间里的人们还围在王德一的周围，周大夫拨开众人，立即为王德一做人工呼吸和各种急救措施，累得满头大汗，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多，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

王德一去世之后，钱瑗就搬出了四合院的历史系集体宿舍，从此我与她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不过到了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校先后成立了“优秀教学成果奖”和“励耘奖助学金”，我和钱瑗都是其中的“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参与评审全校的优秀教学成果和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优秀学术著作等奖项的工作，这样就有机会比较经常在一起开会了。1990年她获得校级“优秀教学管理奖”就是这个期间的事情，那是对她担任外语系副系主任期间所作贡献的表彰。我与钱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我从历史系下楼回家时，在楼梯上碰见钱瑗，她也正在下楼准备回家，我们边走边谈，其中有一段对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说到当时社会上对于钱钟书先生的种种传说时，钱瑗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些传说很多都不是事实，是捕风捉影的编造。”我们在文史楼的西边分手，那时，她还是那样的急急匆匆而又神采奕奕，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年之后她就罹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了。

以上就是我在读了夏先生的大作和杨绛先生的大著之后对于钱瑗伉俪往事的一点补正。这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张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么再过几十年又将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忧心忡忡。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疾呼史以直书实录为贵，可以说直书实录乃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之一。纪实性文学作品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 原载《博览群书》2004年10月22日

~~~~~

## 【亡灵祭坛】

###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罹难者名录

• 陆伟国 •

- 1，王命先，计统系资料员，1966年7月28日在批斗会后投京西运河自杀
- 2，曾老师，农经系教师，1966年8月上旬在东风二楼后侧跳楼自杀
- 3，王裕国，工业经济系教师，文革初在林园九楼跳楼自杀
- 4，郭海云，总务处副处长，文革初投京西运河自杀
- 5，老太太（尚未查到名字），因女儿女婿被关押，自己又要被遣返，外孙将无人看管，想以自己上吊自杀换回女儿回家
- 6，杨俊，人大附中语文教师，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因“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早上他的尸体被席子给卷出来。红卫兵谎称他是自杀。在校的老师说，他那天被打得那么厉害，都已经没有能力自杀了。死时不到四十。
- 7，郑之万，女，人大附中教师，被剃了阴阳头，不堪折磨，1966年8月在家中跳楼自杀
- 8，许惠尔，摘帽右派，1966年8月被批斗致死



- 9, 阚玉瑶, 俄语教师, 1966年9月7日在自己宿舍上吊自杀
- 10, 孙洪, 人大副校长, 1967年10月6日死于被关押的新人大总部新图书馆地下室
- 11, 蒋荫恩, 新闻系副主任, 1968年4月7日在被人大三红关押的南一楼15号上吊自杀
- 12, 何思敬, 法律系教授, 被新人大学工农战斗队关押在北二楼打成脑出血, 1968年4月14日死于积水潭医院
- 13, 吴景超, 计统系教授, 1968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
- 14, 王锡中, 语文系学生, 1968年5月15日晚死于在校办工厂的武斗
- 15, 陈荣祖, 计统系学生, 1968年5月22日死于图书馆新楼西南空地上的武斗
- 16, 廖金妹, 女, 农经系学生, 1968年5月22日死于图书馆新楼西南空地上的武斗
- 17, 杨大志, 农经系学生, 1968年5月22日死于图书馆新楼西南空地上的武斗
- 18, 阮季, 女, 历史系教师, 尚钺夫人, 1968年12月15日在家中浴室里悬梁自尽
- 19, 李尚公, 中文系教师, 1968年12月27日, 工宣队审查期间, 在北五楼用烧红的铁条直刺心脏自杀
- 20, 项冲, 经济系教授, 因受迫害, 逃往上海兄弟处。他的兄弟处境也很坏, 不敢让他久留。他只得回校, 1970年5月2日在江西干校喝敌敌畏自杀(时年60岁左右)
- 21, 陈秋梅, 经济系教师, 在江西干校期间, 用刀片自杀
- 22, 杨树贵, 总务处会计, 在江西干校期间, 用电锯劈脑袋自杀
- 23, 沈士根, 经济系学生, 在1968年5月22日的武斗中身负重伤, 于1970年去世
- 24, 铁华, 计划统计系主任, 在江西干校期间, 1970年夏(1971年?)为救在池塘里溺水的妻子, 自己却沉入水底身亡

说明:

- 1.在我写自己人民大学学生时代回忆录的过程中, 几乎也接触到了人大文革的全过程。我想把已经揉碎了的这特殊的一页, 再铺展开, 拼凑起来。
- 2.这份罹难者名录, 比起之前的又有补充修正。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些罹难者家属对我的肯定, 并提供了一些很珍贵的资料。但这份名录仍然有不少缺憾, 希望能继续得到母校老师、校友、知情人、尤其是罹难者家人的帮助。
- 3.也有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 文革罹难者的范围, 直接死于批斗、武斗的, 当然比较明确。有的是重伤、致残, 尽管当场没有去世, 但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仍在文革期间离世的, 也应该算。又比如, 有两张照片用的是合影, 是否合适? 但这两张照片本身也是挺珍贵的。单独挑出一个人的头像, 怕太小, 会模糊。
- 4.接下来再准备写一篇, 对罹难按不同时间、原因、方式进行分析的文章。人大的罹难者资料, 也是很典型, 很能说明问题的。

~~~~~

【狰狞岁月】

徐霏田之死

• 周继能 •

《打倒联动！砸烂联动！》海报，是1967年3、4月间，我在学校大字报栏揭下来的，收藏至今，已有43年的历史了。

这张宣传海报，是当时配合“联动罪行展览会”的。

海报中出现一位老人尸体的照片，尸主是北京六中校工徐霈田：

我手头上保存着一份叫做《血》的油印材料，由北京六中红旗红卫兵编写（本件是署名北京女六中翻印），记录了1966年8月之后北京六中部分红卫兵虐待、杀害多人的情况，其中说到徐霈田被折磨至死的详细情况：

我校退休老工人徐霈田，68岁，1937年以前在旧社会戏院里当茶房多年，1937—1940年在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当工友，1940—1956年在北京6中当工人，1956年退休后，因单身一人，一直在6中住宿。解放后，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尤其是退休后因病几次住院都治好了，更加热爱党，他经常对人说：没有共产党，我的老命早就没有了。解放后，在6中当工友期间，工作一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以校为家。

今年（1966年）9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小撮人以“老吸血鬼”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撵出学校导致他无家可归，徐（霈田）在街头流浪两、三天后由派出所送回学校，给学校、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一天，天下小雨，以朱支前为首的一小撮人开始对徐进行迫害，他们先将徐拉出屋外强迫徐跪在地上，并脱下自己的鞋令徐用嘴叼着，并让徐自己骂自己是“老混蛋”。这还不过瘾，又把几根木棍放在地上令他在地上爬行，一直爬行至六、七十米处的厕所里，然后将徐推入小便池叫他打滚。徐全身被尿液湿透，再看徐已经不像样子了，徐不能站，刚站起来就摔倒了。这伙暴徒哈哈大笑扬长而去，此后又折磨了几次。

10月3日，下午，徐被王昌明叫到淋浴室。他们说：“给你洗澡”，……先是用冷水泼徐的身体，喊道“冷啊！冷啊！”，然后用开水向徐霈田身上浇。王、陈一边浇，一边狞笑：“老头，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惨叫着“热啊！热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根本不理，反而浇得更厉害了。他们把老人的头皮都烫掉了，浑身通红。折磨完后，老人爬回宿舍，已经奄奄一息，不省人事。10月4日早晨徐要求治疗，不许他出门，不许他治疗。

4日晚10时40分，红卫兵又把徐霈田拉到厕所进行折磨，他们在房梁上安好绳索，地上放个板凳，然后把灯关了。他们强迫徐自己爬上去套上绞索，但徐霈田被打成这个样子怎么能爬得上去呢？这伙暴徒就哈哈大笑，最后把徐霈田活活勒死了。

杀害徐霈田后，他们关了灯，强迫被关押的教师轮流到厕所里，在黑暗中去抱死尸，而这些红卫兵在门外装鬼叫……

胡杰先生拍摄的“文革”纪录片《我虽死去》，片末有一份长长的“文革”死难者的名单，里面就有徐霈田：

“文革”死难者千千万万，能留下影像资料的，凤毛麟角。这份海报，算是留下一份见证，见证一个卑微的生命，在“史无前例”的暴政面前化为齑粉。

□ 来源：《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10年12月4日

~~~~~  
【往事如烟】

清华记忆点滴

• 庸 猫 •

◇ 看客版清华文革前两年

1966年的六月初，陷在四清这个泥潭里快十个月了。没有撤出的迹象。可能文革的大字报已在学校和分团所在公社出现，我们在村里的完全不知。在十号左右上面一声令下，“撤”。真高兴，终于可以从泥潭出去了。

静悄悄的，下车时没有领导来欢迎。他们哪里去了？下车后才知道前几天学校的各级领导被打成黑帮被游街，无论大小，连辅导员也被游了。为了给黑帮戴高帽子，一时“洛阳纸贵”，厕所里放带屎草纸的篓子也没有了。前几天还在村子里宣讲的二十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在清华成了现实。还好，下车的人中没有人戴上草纸篓子。

学校的低年级在闹腾。叶林带队的工作组进来了，刘涛和贺鹏飞为首的高干子弟的临筹成立了。都意气昂扬，闹革命和镇压反革命，没有一个知道黄雀在后。

一件后来引来轩然大波的小事发生了。以三年级小屁孩蒯大富为首的革命小组登台了。桃源经验的创造者王光美挟四清的余威来清华参乱了。小蒯就王先是答应和他们座谈后又不和他们座谈这件小事挑起事端，充分发挥了蒯式诡辩术。624事件是清华文革史不可遗忘的第一大事。

叶林的工作组撤了，阴沟里翻了船的王光美真的栽了。不久前还趾高气扬的“光美同志”栽在小孩手里了。不同情王，也不支持小蒯，他们都不是好鸟。

文革之初清华有很多不可多见的风景线。

大礼堂草坪四周跟吊丧灵棚一样挂满大字报。老毛的最高指示，中央首长讲话，文革要员讲话，“敬爱的江青同志”讲话，原创和转抄和再转抄，还有热炒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出来。像王成一样叫子民向自己开炮，何等的勇气！信以为真。想起才过去的自然灾害，以为领袖知错了，要小民提意见帮助帮助。差点就来上一篇，最后打住了。要写了还不“一文而名天下”，成了最大的反革命。

批斗，大大小小的批斗会。研究生不愧受过最高的教育，只文斗。把系里领导叫来问话批上一顿。系人事科的高奔儿是有名的本分听话的干部，被我们问得差点哭出来。那些低年级的学生就不同了。把刘少奇（应为王光美——编注）骗来，拉上体育馆的主席台躬身挨斗。拉来陪斗的那些部长校长被按着跪下，高贵的头颅从栏杆里狗一样地钻出来。亲眼所见。

各类的黑帮劳改队。教研组的无品芝麻官也劳改。在九号楼边上一队无人看管的劳改队中就看见熟悉的吴老师在拔草，头是参差不平的平头。多年后碰到问他那光头的事，他笑说是匆忙中借推子自家推的。英明呀！系里王教授的老婆是附小校长，她是在二校门当众被剃成阴阳头。也是亲眼所见。

三员工食堂每天中午下午也有亮丽的风景。人要吃饭，黑帮也要吃饭。吃饭时间一到，一队人自动地在门口排成一横排，然后用浑厚的男中音或低音唱出动人的旋律，“牛鬼蛇神嚎歌”。真的很好听。是些比我们大不了两岁的学生会和团委干部。在高教部也听过部长们排队唱着这些不难听的歌。他们都是歌唱高手。

没有笔记，没有资料，就凭记忆把亲眼看到的信笔写下去。这是我的“看客版的清华文革头两年”连续剧的第一集。

每天上午下午两次去看那经幡一样吊着的大字报，吃饭前听那浑厚的牛鬼蛇神嚎歌。彭罗陆杨，蒋刘高何胡艾这样的顺口溜到处可见可闻。不时一个新的姓氏串就蹦出来。读起来真顺，简直是量身定做的。

在清华已待了八年。入学后第一堂政治教育就是反右经验。57年跟蒋校长过不去的就是右派，党委书记也不例外。要听党的话，在学校就是听蒋校长的话，在基层就是听党团干部的话。现在翻个了。几年来天天听他们不能服人的形势一片大好的空话套话，今天要批这明天要批那，颐指气使。对这些遭难的干部没什么好感。恶感吗，也没有。到底是在清华学生金字塔的顶端。这些就决定了我们大多数研究生在文革中的表现，跟着温和地混，起码我是这样。

小蒯和王光美临筹斗法，小蒯赢了。周总理来清华调介，八月四日那天给蒯大富平反的大会在东大操场开。参加了，不能不去，也想去。就是去看看周总理的风采。下着小雨，总理也在雨中。总理是八级泥瓦匠，他就着雨水调合着。清华的泥沙中石头渣物太多，他的本事不管用。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清华只能一种风，从蒋南翔开始就这样。

戏台下的看客也就看看热闹。八八串连会出来了，第二天一个观点不同的八九串连会也出来了。观点是什么，不清楚也不感兴趣。

A月B日一个指示，C月DE日又一句话，AB或CDE这样的数字串不断涌出。老毛出面了，不断地接见全国赴京的学生。戴红底黑字袖箍的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去天安门是外地学生的心愿，我们稳坐清华园。

一天，824，无数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中学红卫兵涌到清华。满脑正义的王研究生去和这些红卫兵辩论。和头脑发昏的小孩有什么好辩论？眼镜王的眼镜被打掉了，没挨上几皮带是运气。

在这些红卫兵的眼中“清华”被解释成清除中华。“清华要废！”。好像就在那几天的一个傍晚二校门被砸了，原有的文物级清华园牌楼彻底消失。教过我的王教授的老婆在那里被推搡着剪了个阴阳头。我在附近看着，无奈也无能。

不知何时清华开始死人。记得一天在西大操场开大会，突然听说有人跳楼了。一个运动员从二楼楼的二楼跳下来，摔死了。一个体操运动员从二楼跳下就这么摔死了。原因，据说耍了流氓。又一早去食堂时听说西区澡房旁边的十六宿舍下躺着一个死人。跟着去看，是一个右派或前右派夜里从三楼跳下来的，早僵了。

研究生是个特殊群体，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每个人自己一摊。现在也不去系里和教研组了。不和学生搅和着斗老师，不和老师搅和着内斗，研究生也没什么互斗。老师挨过什么大字报，我头脑一片真空。

五花八门的组织和红卫兵冒出来了。高干子弟的，根正苗红的，不那么正的，痞子的，连历来的打击对象的也造反成立了红教联。打个旗就是红卫兵。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好汉们的父辈从英雄变成反动，子弟也就混蛋了。高干子弟的临筹和正宗红卫兵不知觉的消失。

串联去！一声呼声惊醒梦中人。我们年级十个研究生的九个就结伙出发了。不是步行长征，是火车周游。别的人如何不知道，我是窜游。开始集体行动还有些顾忌，后来放双再后单飞就只有游山玩水了。十月底出发，十二月一身夹衣回到北京。回京的火车空空荡荡，真冷呀！读给老婆听，她说她是跟两个北京的中学生混到北京。火车空空，以为可以睡上一觉。可是“真冷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十二月窜回来，到宿舍，被子不见了。一问，借到接待站。去找，居然找到。脏不脏顾不得，暖和。进入1967年，老毛继续领导着折腾，造反派闹得更欢。学校的红卫兵换班了，小蒯开始当政。原来高干子弟领导下还有点章法，现在痞子就胡来了。

没几天蒯痞子一伙把刘少奇骗到学校（刘少奇并未被骗到学校——编注）。这白区来的怎么这么好骗？前面写的部长校长跪着把头钻出体育馆主席台的栏杆窟窿就是这一次。整整齐齐的一排从栏杆的洞中钻出来的头。当年在酷刑下也不从狗洞里钻出的豪情哪里去了？二月逆流的老帅有骨气，大部分官员没有。没一个站出来振臂呼一声“救救这个国家和人民吧！”。无数我这样的小屁民和阿Q一样浑浑噩噩，麻木地举手跟着喊万岁。

老蒯扬眉吐气了，在主楼前的广场上把王光美拉上批斗台。彭真蒋南翔这样的大人物只是陪斗。王光美穿着旗袍戴着兵乓球串上场了。最后押着她的红卫兵脚一拱，她跪下了，给老蒯下跪了。其实她也没把这痞子真怎么了，不该这样对她。也不同情她。当时不，现在也不。想想她和那些官们大权在握时是如何对别人的就不同情。挤坐在广场上，在中间偏前的地上坐，跟着呼口号，看着和撒切尔有一拼的王光美下跪。鱼龙混杂的造反派也不全是极左的痞子。分裂了，一批温和派在造反派中造反而出，分裂出温和的414。大部分研究生是414。我哪派也不是，只是同情414观点的逍遥派。我想我们系研究生中没有写申请加入任何派的就我一人。逍遥派也不能什么活动也不参加。要靠一派，靠哪一派就沾上哪派的派性。靠上414，是参加414活动跟着高唱完蛋歌的逍遥派。

老蒯要成立一统江山的革命委员会，414要搅黄它。入夜等待着搅局的命令。半夜广播通知周总理不来了。414不战而胜，放心地去睡觉。

中南海西门的揪刘少奇集会去了。轮到了哪能不去。乱哄哄的，高音喇叭震天响。那噪音不是常人能忍受的。来过了，又没人管，点完卯就回家。

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游行参加了。不能不去，骑着车跟着去的。没看见放火的场面，可能是我们离开后的事。杨余傅、王关戚那阵又乱了一阵。

儿时的好友回南京时就混在他们中间搭免费车去南京。目的明确，不是去乱军，是玩，是去看看小时住过的南京。早上到南京找到414联络站去蹭住。碰上他们要游行，只得跟

着去。他们得罪了当地的地头蛇，一个无线电中专的造反派。游行才回来正准备补回昨晚坐一通宵火车的觉，一伙人闯进来把我们绑走了。

说绑不确切，是被看着带走的。到了他们学校后分别看管甄别。我是实话实说，就是来看看小时待过的南京。没打没骂只是把证件收走。甄别完毕已近黄昏。

下面一幕有点令我吃惊害怕。在实枪荷弹的半大孩子包围下被押上卡车。车开出南京，不知往哪儿去。真有点临刑就义的感觉。事已如今，完蛋歌的“完蛋就完蛋”和“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豪情顿生。真的，那时就是这种感觉。

车在空荡的公路上开着。突然车停了。“下去，下去一个”的喝声。要玩完儿。一个同学下去了。车又开了，没开枪，是流放。一会儿又刹车了。我比别的都大，不能让学弟看瘪，我下去了。车开走，一人站在这不知是何方的公路中间？往哪儿？往回走。不久碰到第一个被流放的，他是往前走的。原来他是我这方面的师兄。被流放时大家往中间走，在中间集合。

终于我们这些遭流放的人都会齐了。天已黑，在一农户的牛棚中过了一夜。从主人那儿知道我们到了句容。第二天到镇江再回南京。找到好友家，他家正为我的失踪耽心。

不敢再参加和地头蛇对抗的活动，小玩几天回京。在泰安下车爬泰山，玩，也压惊。

南京被绑架流放有惊无险，平安地回到学校。

文革闹腾了一年终于有人想到66届本科和研究生已拖了一年还留在学校，67届的也该毕业。也许上面想的不是这些人要养家糊口而是留在学校是祸害。

学生不上课，研究生不搞科研，老师不教书。除了看大字报和斗，无所事事。早厌倦了。上面要搞路线斗争，下面搞线路斗争。男耕女织，男生装收音机女生打毛线。买处理电子管和晶体管攥收音机。买废铁皮敲底盘。自己腐蚀印刷电路板。旧喇叭的磁铁骨架自己换纸盆。跑得最多的是海淀镇上的回收公司。一个个都成了电子好手。

那时我们系的研究生，今天的院士教授玩的要叫人笑掉大牙。一把彩色的竹签子，抓住手一送散开，然后一根一根往起挑。碰动了别的签子就换人。然后按颜色和数量定输赢。有人挑签子有人围观，没事就一堆人。吃饭都忘记了。实在饿了，封起来等吃完饭接着挑。好不热闹。这事儿可能除了我，没人会提。不过这是当时上面大喊革命，下面无所事事的真实写照。

政策是66届研究生按毕业，67届按结业，68届不算研究生。待遇，我们67届先拿研究生实习工资的90%，报到后拿大学毕业转正工资。蒋校长标新立异，本科比别校多一两年，研究生多一年。在四五年制大学，我们是64或65年毕业的研究生。到清华成了67届。在按工龄定工资待遇的现实中老蒋害惨了他的学生们。凭这个，他该斗。当然这是说笑。读书无用呀！老毛间接说的。

分配要做鉴定。鉴定要放在档案一辈子，没人敢掉以轻心。吊儿郎当少了，去小汤山劳动个个老老实实。

分配拖到68年初。我们专业，我和一个同学到西安的研究所，另一个到沈阳的工厂。比大学毕业时的分配方案差远了。有什么办法？没发配下乡就不错。

1968年四月终于离开了待了近十年的清华园。低年级的同学还在如火如荼地革命。学校老团老四间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但革命已不关我们什么事。

和另外三个分到西安的研究生上了西去的列车。报到，所里大吃一惊。他们没有要研究生，专业也不对口。再查，若干年前申请过大学生，早不要了。联系大院里对口的研究所和工厂，都不要。还是去报到的研究所宽宏大量，说先回学校重分配，万一还没人要可以回来。两个清华的研究生居然成为没人要的垃圾。

高高兴兴地回清华重分配。武斗已经开始。好不容易找到人事科的高奔儿，在系里和战区另一面的工字厅间奔波。开始答应找新的接受单位，后来不管了。板起官僚主义的面孔“要服从组织分配”。分错了也要服从。难怪，我们研究生斗过他，尽管那时我连屁也没放。虎落平原呀！

北航造反派一个头头写：文革中除了逍遥派，都整过人也被别人整过。我是那种不整人也没挨整的逍遥派。要说有什么错，给一个因派性被揪斗的老师照过相。仅此。

2015年8月

◇ 砸二校门那天

六月上旬八字班以上的从农村四清仓促撤回，离春节休整不到半年，清华园已不姓蒋了。蒋家王朝倒台，高干子弟、叶林、王光美和蒯大富们已先后登场。已过了戴厕所竹篓游街的热闹，至于斗老蒋们是否正浓记不清了。那么多眼花缭乱的斗如没有日记谁能知道哪天做了些什么？

研究生是个特殊的群体，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不参加学生的活动也不参加老师的活动，就活动在三号楼到二校门这一块地方，连教研室和系馆也不去。老实说，哪些老师挨了大字报我不清楚。

系里的研究生除五字班的几个都惰性十足。每天到大礼堂前去逛一圈，看看吊孝一样的大字报，然后回楼和吃饭。

八一八去天安门论不到我们，但以后几天的巨变知道。本人差点中了炮打司令部的忽悠，还好最后一刻忍住了。

八二四那天一早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就到清华来示威了，一队一队穿着旧军装拎着军用皮带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半大孩子在校园里转。那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小女孩红卫兵也凶神恶煞。

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喊他们的口号，我们旁观。有不服的，五字班的王研究生有正义感，胆大，和红卫兵辩论。结果被推搡，眼镜都被摔碎了。他回来讲，我们为他没挨皮带抽而庆幸。跟这帮暴徒有什么好辩论？

中学红卫兵叫唤清华就是清除中华，要彻底砸掉。他们不光是叫唤，真要动手了，他们选中二校门。听到消息赶去看时已开砸了，记得看见有人把附小的女校长拉到场剪阴阳头。有学弟回忆“我也去二校门看到了，看到校领导老教授们被鞭子皮带抽，看到他们哆哆嗦嗦抬着明显超过他们能力的大石头，看到二校门被轰然推倒。不知道这二校门和文革有什么关系，高音大喇叭不停地叫着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位学弟就站在二校门对过的小桥边，那时我在校卫队那边。在这种红色恐怖无处说理的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呢？如此时王研究生站出来大概就不是早上的推搡了。

记得小学校长是因为听说她是王先冲老师的夫人，那样子闭上眼睛还能看见。因为是听说，一直不确定。今早在清华的群里一问，还真是王师母尚复珍，附小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她是体制中人，那天那些体制外的“地富反坏右”真不知怎么熬过这红色恐怖的？父母家也被抄了多次，父亲应是有豁免权的无党派人大代表花瓶呀！

清华被破的不止二校门，工字厅前的石狮子也栽倒了。还好土匪们没有放火，要烧，工字厅将首当其冲。

清华的高干子弟参加了砸二校门了吗？有人说看见贺鹏飞在指挥，高干子弟是组织者领导者，他们不会亲自抡大锤。不知道那位抡大锤砸二校门牌匾的二货是否知道自己已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清华大学九十年”说“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纠集11所中学的红卫兵来校搞红色恐怖，撕毁所有的大字报（其中有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推倒‘象征封资修’的二校门。”。

八二四是被称为破四旧的革命行动，无数无辜的生命从此消失，无数的文物化为青烟，无数的古迹成了废墟。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吗？没有。要有，也是推到红卫兵的身上。小孩会胡闹，要他们上房揭瓦，会有的。好人家会允许自家的孩子去揭别人家的瓦吗？

2018年3月5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